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瑜自选集/赵瑜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0 3
ISBN 7-5440-1855-5

I. 赵… II. 赵… III. ①赵瑜-文集②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516 号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625

字数: 362 千字 定价: 26.00 元

献给太行

——写在前面

赵 瑜

由于山西教育出版社朋友们的热忱，使我有了一次出版自选集的机会，我又把这个机会捧给了我的太行山——这次所收历年作品，全部以山西本土为写作对象。这对于我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土地赐予我们果实，我们忠诚于土地。巍巍太行是我终生崇拜的山。我们必会消亡，太行山永远年轻地活着，她大而无言地注视着我，她真实而本色。回头再看这书，使我惶恐使我胆怯。我沉沉质疑自己：你和你的写作真实而本色吗？是否！太行山就这样不停地在警策着我。这警策在我的灵魂深处，伴我走过了许多回春夏秋冬。然后，跨世纪。

1999年10月10日于太原

目 录

太行山断裂〔1〕

玉峡关纪事〔54〕

中国的要害〔64〕

新形象之诞生——马朝亮的高度〔104〕

第二国策〔131〕

我们寻找什么〔191〕

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化大革命中〔249〕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387〕

根据地〔435〕

附录：赵瑜创作年表〔459〕

太行山断裂

即使披露往昔的事件，作家的视野也向着今天。

倘若记述眼前的事件，作家的良知更向着明天。

——创作手记·1986

全国著名的中共晋东南地区委员会以及该地区的行政公署，在一个早晨，从太行山上消失了。在所有的文件和各种资料中，她已成为一个历史名称。取而代之者，居然叫做“内地的特区”。

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上级工作组突然来到了山西上党古城——长治市。这里是晋东南地委和晋东南行署所在地。一千人马当下进驻新开张的太行宾馆，洗完澡吃完饭散完步，准备练活儿。他们的任务很简单：把这个地委撤掉，把这个行署也撤掉。

人们毫无思想准备。整个地区顿时乱了！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按部就班难上难，乱起来却很简单。一张大字报，足以乱你8亿人。

威严的莫斯科结婚蛋糕式建筑——地委五层大楼一时间变得很脆弱。它终于停住了中年人豪迈进发的脚步，突然显得苍老、飘摇。

每一道走廊里站立着惶惶不可终日的干部们。所有的办公室

敞开着大门，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大声吆喝着出入，原先的庄重肃穆一扫而光。

旧文件的纸页在水磨石的地板上散落，匆忙紊乱的脚步在上头踏下了歪斜的、灰色的印迹，同那历史的名称“晋东南地区……”叠在一起。

时间是：1985年5月中旬。

压根儿不可能的事

工作组真的来了吗？上头真的要干糊涂事吗？

历经半个世纪风雨磨练的老区干部们摇着头，不敢相信：上头怎么会做出这般荒唐的决定？为什么没有人和我们商量商量？

两月以前，即1985年的春天，老区的干部们针对这里可能要实行市管县的风传，曾经做过自发的讨论研究，特别是那些有相当好的理论修养并且十分冷静的中年干部们，研究的就更深入透彻——

第一，晋东南地区经过十年动乱，形势刚刚好转，消除派性以后，各行各业刚刚理顺，势头正佳。1984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地方财政收入，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农民人均收入比1978年增长2.6倍，也是历史最高水平。上头绝不会不顾此情，再搞人为地震，去断送历史良机。

第二，市管县的条件在太行山上太不成熟。这块地面上目前的两个市——长治和晋城，都没有实力去带动十几个尚在贫困当中挣扎的县。所谓市管县的改革，实质在于解决经济发达地区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的问题，以适应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而贫困老区的燃眉之急是要在安定的局势下开放搞活，重在脱贫。正因为这样，国务院才对实行市管县的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一是市区非农业人口最少在25万以上，而晋城市才6.8

万人，差着 18 万多人。二是市区年国民生产总值要在 10 亿元以上，而晋城市其市营企业的产值仅仅才 6 千万，连 1 个亿都不到。长治市也不达这两个标准。这两个市虽然都有一些工矿企业，但地方工业并不发达，主力都是直属国家部委或省里，其产值并不与地方财政收入发生什么关系，不能搞虚假的一揽子算账。并且，长治市的亏损就是全省所有企业亏损的一半儿，裤腰带勒了一回又一回，又凭什么去对遥远的贫困县产生辐射和吸引？对于国务院的上述标准，国家民政部民政司负责同志在《中国民政报》答记者问时毫不含糊：

“这是最低标准线，已经适当放宽了，若再随意降低，必然造成标准混乱，影响整个国家的行政区划体制，进而影响各项事业的发展，应当成熟一个搞一个，不能拔苗助长！”——这些大的标准省里头不会不理睬吧？

更何况，晋城市在一年前还是一个县，刚刚改成县级市，上头就连这也不知道？

第三，在一项大政策实施之前，上头绝不会对群众保密，还不让大家议一议呀？共产党啥时候兴对群众保密？搞老区的改革还对老区人保密？对老区人？笑话！共产党离了老区，哪儿还有共产党的今天？我们总结历史教训都总结到这份儿了，还会搞害死人的形式主义吗？还会搞一窝蜂吗？1985 年能办 1958 年的事儿吗？1958 年还不保密哩！

——干部们的分析研究不能说不透彻。有理。

另外，晋东南行署专员扈耀光同志在那年春天，就晋东南地区是否适宜进行市管县改革的问题，也向省委调研室明确提出过三条意见：一，条件不成熟，弊多利少，最好不搞；二，如果市管县是方向，那么，地区再带一段晋城市，扶植它好好发展发展，条件具备了，再搞不迟；三，如果上头非搞不可，那一定要慎重研究怎么个搞法，不要让贫困县都集中到长治市身上（长治

市在“文革”当中独立为省辖市，后来带了潞城县、长治县两个县)。

说来说去，大家无非是一个愿望：咱老区，咱中国，实在不敢再折腾啦，咱穷得叮叮当当的，三中全会以后刚吃了两天安稳饭，折腾不起啊！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善良的太行山人在那年春天的说法都很一致：压根儿不可能的事儿！不要乞吵吵！

这么着，近2万名干部职工，5万家属，不论是谁，都没有个思想准备，都不相信那明媚的春光里的传言会是真的，——上头不糊涂！

还有一颗定心丸，很关键，那就是法。按照宪法规定，省内行政区域的变更，需经省人民代表大会立法通过。而现在，直到1985年的5月初，省人大的同志们还一直在纳闷，说：我们根本没有研究过这档子事儿，的确。

压根儿不可能的事儿，早说过的。

但是，1985年5月16日，省里派来的联合工作组，不容置疑地还是来了。其工作的实质内容如下：

在撤销中共晋东南地委的同时，撤销晋东南地区行政公署。将长治以北的襄垣、屯留、长子、平顺、壶关、黎城、沁县、武乡、沁源九县以及原先领导的潞城、长治县和城区、郊区——共计13个县区，人口269万，划归长治市管辖。注意，这些县全部是吃国家补贴的贫困县；另将原先的晋城市（县级）一分为二，切成城区、郊区两区，把原地委、行署机关搬迁到100公里以南的晋城地面，新建一个地市级的晋城市，管辖沁水、陵川、阳城、高平四县和城郊两区。注意，其荒唐在于先建立一个新市，然后再去市管县，于无中生出个有来。

以上方案，于1985年5月上旬，即工作组出发的前几天，

由省人大在仓促间补充通过。

对于这项重大“改革”，宣传上当然要过硬得很，那口号的提法是：一定要奋发图强，把太行山建设成内地的特区！既新鲜，又时髦；既响亮，又独具一格。

谁说这事儿压根儿不可能？

饱经沧桑的老区人发出悲哀的浩叹：“又要乱啦！”

最后一次常委会

在联合工作组到来之际，在历史的严峻时刻，这个著名的地委召开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常委会。

常委会在极其沉闷的气氛中进行。

情况已很明了：晋城市并非如请示文件上所说的是什么“升级”为地级市，而是要把上万名地区干部、几万名干部家属搬去，重建一个地级市！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非大搞基本建设不可！保守的估计，没有5个亿下不来！又拿什么去发展好的经济势头？长治市连年亏损，所带13个县区全部是吃国家补贴的。过去全区以南补北，正在脱贫，而今后，一个讨吃的带上13个要饭的，又怎么发展？不是市管县，是市吃县吧！

我们这样一个山老区，刚刚喘过一口气来，架得住赶这个时髦吗？

要命的是，那时的山西经济重心又要西移，我们会失去千载难逢的战略时机的。惟这时机最为可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不我待哟！

大家凭着多年的经验和对一个地区的熟稔，已经预感到这次变动不是一次历史的必然，而更像一次冒进的失误。更谈不上什么改革。但，上级的决定不服从行不行？太突然啦，没有思想准备，小道消息一下子变成了现实。

服从，还是盲从？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常委会会长久地沉寂着，每个人的思路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一个议题上：工作组来了，我们是顺着说？还是讲真话？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面前，这些饱经风霜的常委们又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真是一个小学生呢。

一阵儿，地委常委们又想到，是不是俺们真的老化了？真的跟不上趟了？不是说知识要更新吗？全国搞市管县，也不是咱们头一家，对了，快快把已经搞了市管县的省市的情况摸一摸，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呀！听说江苏搞的不赖，是个什么情况呢？

1983年3月1日起，江苏省原有的7个行政专署，7个省辖市，64个县和4个地辖市统一实行了市管县的新体制。而那江苏，是我国少有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富省，如果沿用旧体制，经济发展就会受到抑制，搞市管县是水到渠成。

就说南通市，南临长江，东濒黄海，素称“江海平原”，是长江入海口北岸的一个港口城市，为全国46个重点城市、27个出口商品综合生产基地之一。其工业基础雄厚，技术构成较高；市周围商品生产发达，农村各项产品的商品率高达73%左右。市管县后人家带了6个县，面积也不过8000多平方公里。而晋城市为9161平方公里，长治市竟达13639平方公里。

再说连云港市，又是一个开放的港口旅游城市，新带了3个县。这3县距离市区仅40多公里，吸引着农民们脚一抬就进城，朝发夕还。城市正好辐射。

常州市呢，1983年仅工业总产值就高达60个亿。人家才带了3个县。而我们的长治市，1984年倒亏了1100万元！

无锡市及无锡县更了不得！全市光“亿元乡”就17个，“千万元村”25个，光市区就有12个“亿元厂”。无锡是中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高达144个亿。所带几个县区中，无锡县一个县的乡镇企业产值就达20个亿，比长治、

晋城两市同期全部工业产值（包括国、省、市、县、乡）相加的和即 14 个亿还高近三分之一。晋东南全部 16 县两个市，加起来还比不上人家一个无锡县的乡镇企业！——事情很清楚了，人家不搞市管县不行！老的行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发展，中心城市必须发挥作用。党中央、国务院确定在江苏进行全省范围内的市管县体制改革，是正确的，利多弊少。

再简单不过的议题：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平时多好回答！改革，最怕搞花架子，最需要实事求是呀！国有国情，省有省情，市有市情，中国最忌浮夸好大，我们却最喜欢浮夸好大！总也改不了，改不了！

是什么加深了他们额头的皱纹！党多年的教育和栽培使他们正义感充满胸腔；无数历史的教训，使他们心中如明镜高悬。而现实的严酷，又使他们的思路常跑到别处去，意识在流动——

怎样才能不得罪上峰？我们是多么习惯于服从。

我在省里领导那儿——印象如何？这可是直接关系到这次“改革”后的安置使用。这念头一闪一闪的，多不好！可又驱不散。

唉！1958 年，彭德怀说了实话，今天说他是党人楷模，可他当时吃了眼前亏……

1967 年，张志新说了实话，女大英雄，百世流芳，可她被认做神经病，又被割断了喉管……

赵树理，在座诸位的老朋友，他称得上实事求是啦！他矮檐之下不低头，高压之下不嘴软，怎么样？他得舍上那条一身才华的命哟！

彭大将军……

志新女士……

人民作家！

惟在此时，才让人真正感到了他们的伟大，难能可贵啊！

生产关系，既不能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更不能超越啊！地委常委们又这样想。

大跃进的时候，晋东南不是没有教训。那么多的人，欢呼屯留长子两县合并为一个大县，叫什么屯长县，集中财力，在鲍店一带平地起城，土堡盖了一多半，行不通，废在那里，至今风姿尚在。那土城子，记载着我们的“左”倾冒进，记载着我们的多少狂热啊，真应该再去看看。那时候，社会主义还不知道啥滋味，就提前看见共产主义的曙光啦。

一个人说鸡毛能上天——

马上有人说他亲眼看见鸡毛在云端里翱翔。

一个人说公鸡能下蛋——

“那蛋孵出的鸡娃都结实！”

一个人说沙锅能捣蒜——

“我们家捣蒜用的就是沙锅！”

当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我们吃亏了。农村中，由最初的互助小组核算，升为初级合作社核算，继而高级社核算。1957年我们批判了“右倾保守”，毛泽东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在小的胜利面前开始骄傲自满，对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主观地认定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已经到来，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发动一个“大跃进”运动。

1958年1月，党中央在南宁开会，讨论当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了去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使主张实事求是、注意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经济的部分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受到了压制，直至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中央的集体领导，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膨胀。

3月8日至26日，党中央召开成都会议，连续发出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而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

从南宁、成都两个会议起，大跃进运动逐步形成。到了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再次人为上升，为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堵塞了关于大跃进的民主言路。这次会议以后，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高指标尤其是钢指标开始，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开始铺开。

党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虽说文件所提还是“适当地”，可谁又敢不适当呢？倒是生怕合并的慢了，有走错“道路”之嫌，于是并社工作如火如荼，席卷中国，当时就连个比较准确的名称都没有，有的叫“共产主义公社”，有的干脆就叫“××大社”，有的照搬苏联，叫做“集体农庄”，不一而足。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大报小报立即发表了这个谈话，于是，小社转大社尚未实践，全国就干脆直奔人民公社的热潮去了。从1958年夏季始，只短短数月之间，全国74万多个合作社改组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达1.2亿多户，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99%以上。平均每个公社4600多户。

可悲的是，为了讨好买表扬，也生怕落后了挨批，浮夸虚报开始毫不脸红地变为正常的领导艺术。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基于对当年农业的过高估计，会议要求各地把工作中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而工业的中心又是钢铁。在这个会上，又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它一番。同时，北戴河扩大会上还正式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

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唉！那时要有人站出来搞什么科学论证，怕是决没有好下场。

当年，我们忽视经济规律，急于过渡，急于改变生产关系，换来的是什么？别的换不来，惟独换来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

公社共了队的产，穷队共了富队的产，到处实行大食堂，供给制，农民被剥夺成赤条条！一平、二调，没边没沿儿的。谁能忘掉，那以钢为纲的口号震撼云霄，万户千家把眼睛一闭，砸锅炼铁，村村社社废了庄稼……

这并不遥远的悲剧，我们在座的地委常委们哪个不曾经历过？

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

翻过一架历史的大山，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然而，粉碎“四人帮”易，除却“左”患影响难。

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建和续建126个大型项目

10大钢铁基地。

10大油气田。

9大有色金属基地。

8大煤炭基地。

30个大电站。

6条铁路大干线。

5个重点港口。

从世界各国引进22个大项目……

这些项目的提出和很快执行，不可避免地又一次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我们的老毛病一犯再犯。

“土跃进”完了，“洋跃进”开始。“左”害无穷尽！今天……

“我们怎么办？多数常委都在，大家议议，我们该咋说？”常委会在继续。

“实实在在，讲真话。”一位干瘦的老者首先这样发言。他已经沉默了许久。

同志们都深深地点头：“讲假话对不起老区人民，对不起咱这个老地委！”

一番经济形势的汇总分析之后，常委们的意见趋于一致：市管县的方向，是正确的，像江苏省，经过实践证明改得对。但晋东南地区条件确不成熟，希望省里能从贫困老区实际出发，慎重考虑，最好缓行。眼下，一定要把握局势，防止骚乱，避免给国家带来大的损失。

意见统一了，那么到了工作组召开的座谈会上，由谁来讲呢？

为协调各方面关系，常委们决定：由地委两位秘书长、行署两位秘书长4位同志为主，向工作组陈情！

这个著名地委的最后一次常委会，就这样结束了。党没有白培养他们。

人们的脸上，满是悲愤忧戚之色。

八双眼睛放异彩

转天，工作组与地市两家共同召开的市管县改革座谈会在太行宾馆六楼会议室进行。

人员陆续到齐，最大的遗憾是，偏偏工作组的几位主要领导次日才能由太原到达。今天在座的，可惜都是工作组的一般成员。

4位秘书长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正襟安坐。他们久经官场，能征善战，语出有据，论出有理，既能把握分寸，又会捕捉时机，尤为重要的，是善于保存自己。一张张脸上，郑重而不慌乱，豁达而不狂放，陈情一板一眼，功夫不凡。

他们分别讲了几个问题，先是大讲在三中全会以来，整个“六五”期间，全区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平均每年递增8.7%，保持了持续、均衡、稳定、有后劲的好势头。农业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潜台词：时机可贵，不可折腾！）

然后陈述全区经济发展呈现着南富北贫、南快北慢、以南补北、联合协作、自我平衡的过渡状况。整个晋东南地区的存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确有其合理性。（潜台词：人为割裂，违反科学！）

最后进行利弊预测，放谈长治市以穷带贫、前途暗淡之苦。

以上三条有着内在的逻辑的力量。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论，结果自知矣！不难预料在不久的将来，长治、晋城两市，显然要出现市县之间相互制约、抵消财力、自身难保、骑虎难下的局面。

晋城方面呢？按照省里意见，晋东南地委除部分干部移交长治市外，剩下多数干部都要向南开拔，去重建一个“地市级的晋城市”。那么，惟一的办法，就是基建上马，平地起楼。前面说过，最保守的数字，没有5个亿下不来，国家是不可能给你这笔钱的，省财政也只能意思意思，这就意味着惟有晋城市自己掏腰包，这又意味着晋城虽比长治富一点，但在10年之内，也甭想再有力量发展生产，且无法稳定思想。

而晋东南地委历经建国35年的时光在长治逐步建成的一整

套行政、生活设施，也将由于机关撤销人马南迁而不得不白白扔掉。这里不仅具备地委、行署的办公大楼，而且下属有着水平和规模都满像一回事的整体系列：小学、中学、10所大中专院校；白求恩和平医院、二医院、中医院、大宾馆，太行山上最好的幼儿园和演技精良的文艺团体。人才济济，林林总总，价值万万。

就长治市而言，同样具备一整套上述机构，那也是30多年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原先长治还是隶属晋东南地区那阵儿。这一套东西早就“小而全”了，在“文革”中升为省辖市之后，这机构更是日益庞大，仅党政干部已达3000余人，超编过半。这说明，长治市并不需要这样一套同等机构，重叠翻番。

多余的人，做多余的事。

多余的机构，生多余的是非。

就这样，4位秘书长一是一，二是二地讲了实情。这真是对他们几十年练就的官场谈话艺术的一次考验。

他们不负众望，表现极佳，炉火纯青。

工作组的成员们，边听边点头，从眉宇间皱起了“川”字沟，到身体开始前倾，到点头称是，到表示感叹，到说出颇带欠意的话语：

“啊，真没想到这几层！这事儿……”

“……唉，我们也搞不清咋回事，人家组织了工作组，让来，就来了。”

“等领导来了，你们再重新讲一讲。”

4位秘书长出了一口长气，深感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决非荡然无存，这些省里的干部们，不是都挺通情达理吗？

有希望！8双眼睛放异彩。

要紧的是，当前谁都不准闹事！4位秘书长的意见很一致，必须抓紧做好同志们的工作，要相信党的力量，依靠组织的力量。闹事就会给党造成不良影响，就会给人民带来更大的损失。

很快，一批老区的共产党人向各个角落，向无数基层的骂街者做了工作：要自觉遵守纪律，谁也不要胡来！

注意“三种人”

不错，4位秘书长算是“出了线”，尽了力了。而反过来说，也就是力也尽了。他们已经完成了职责，剩下的，是别人的问题。

第二天，工作组负责人——组长、副组长到达目的地——太行宾馆。

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召开重要的会议。

两市主要首脑，包括力尽之人——4位秘书长，共聚太行宾馆听令。

工作组负责人一一讲话，紧紧围绕市管县这一改革，分别谈到：

表达省委的改革决心；
揭示改革的伟大意义；
指明改革的正确道路；
阐述改革的大计方针；
描绘改革的光辉前景；
落实改革的具体方案；
迈出改革的关键一步；
端正改革的思想认识；
传达改革的办法意见；
确立改革的必胜信念；
宣布改革的领导班子；
经受改革的重大考验；
完成改革的历史使命；